

杭州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133319

97/54/27

杭州文史资料

第四辑



K2506
4030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编辑凡例

- 一、本刊是资料选辑，印行的目的，在于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并通过它，激发读者的爱国热忱，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更好地为振兴中华服务。
- 二、本刊选载资料，以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对确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译文、旧作、遗著和代人整理的稿件，也酌情选载。
- 三、本刊选载的资料，主要是从辛亥革命（1911年）以来至“文革”前各历史时期的各个方面的史料。
- 四、本刊选载的资料，尊重撰写人的观点。但史料务求翔实，本刊视需要可节录或作文字上修改。
- 五、本刊资料，欢迎读者订正、补充。
- 六、本刊暂为不定期刊，目前只限内部发行，欢迎各机关、团体、单位、图书馆（室）及个人购买。

目 录

我的外太公章太炎二、三事·····	邹立人(1)
吕公望先生自传·····	吕公望遗稿(7)
忆先父吕公望的几件事·····	吕师煜(26)
我随蒋介石在杭州的一段回忆·····	汪日章(30)
蒋介石父子在故乡片断·····	汪坚心(34)
回忆蒋经国的几件事·····	焦积华(43)
抗战胜利后的杭高·····	崔东伯(47)
杭州师范学校校史片段·····	陆菲琼(53)
我在国民党航空学校的见闻·····	方 耀(67)
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简史·····	洪永权(84)
回忆“力余座谈会”·····	郑琴隐(90)
浙江省青年夏令营·····	陈宪清(94)
浙江新闻团体沧桑录·····	钟韻玉(96)
解放前的杭州“大世界”·····	姜继心(100)
盖叫天收最后一个艺徒·····	王立均(103)
江笑笑和滑稽戏·····	徐永华(106)
余杭“草索帮”·····	黄品璇(114)
解放前的杭州钱庄业·····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118)
杭州叶种德堂国药号·····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126)
边福茂鞋店·····	杭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组(135)
致读者·····	本刊编辑室(141)

我的外太公章太炎二、三事

邹立人

章太炎先生是我的曾外祖父。我的外祖母章珪(音展)，于一九七三年去世，是太炎先生的幼女，九岁就随太炎先生东渡日本，以后又随他老人家辗转南北。我的母亲是外祖母的独生女，生下我不久便不幸去世。我出生四个月后，就由外祖母抚养，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记得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直到外祖母谢世止，她就常常将太炎先生的轶事讲给我听，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不少都已淡忘，但某些片段至今记忆犹新，现记叙如下(附太炎先生遗照一帧及六十寿辰自述诗手迹)，作为我们后一辈对太炎先生的一点纪念。

太炎先生是浙江余杭县仓前镇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乡绅家庭。他的曾祖父名均，字安圃，家道殷富，资产百万。祖父名鉴，字聿昭，喜金石之术，遍购古今医书，自学三十余年，遂行医为业。父亲名濬，字轮春，喜读书，家中藏书颇多。其时，正值太平军扫荡江南地主乡绅，家产毁于战乱，仅遗田产三十亩。太炎先生是四子，因长兄早年夭折，故排行第三。太炎先生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七岁受业于外祖父朱有虔先生，并受其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太炎先生的夫人王氏，继夫人汤国梨老太太。他共有三女二子。长女名焱(音丽)，年青时即去世。次女名焱(音绰)，现健在，居于本市。小女名珪，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获硕

士学位，多年从事教育事业，于1973年去世。长男名导，现居苏州。次男名奇，早年即留学美国，专攻热核物理学，后从事尖端科学的研究，至今音讯杳然。

太炎先生兄弟三人，自幼感情深笃。大哥章箴年四十七，尚无子女。故太炎先生将年仅一岁的二女章爰送于长兄为女，并由其抚养长大。后来又在太炎先生的倡导下，兄弟之间将自己所有子女，不分谁家所生，均按年纪之大小加以排列，视为三家共同的子女。太炎先生年青时就已经很少封建宗族思想，同时也正是由于太炎先生二位兄嫂的扶持和帮助，才使太炎先生在夫人王氏去世后得以全部精力和时间投身于革命运动。

太炎先生曾先后二次去日本。第一次是在1899年，他先至台湾，再到日本名古屋市，逗留、考察近二个月。其间曾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受益非浅。回国后不久，即发生了举国闻名的《苏报》案，太炎先生被判监禁三年。据史料记载：

“章氏在狱中备受艰苦，而革命之心毫不动摇。”1906年6月29日，太炎先生获释出狱，孙中山先生及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接他赴日，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自此，太炎先生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改良派的丑恶面目，抨击投机分子的卑劣行径，积极阐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宗旨。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正气浩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赞扬的，“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在主编《民报》的同时，还在日本各地讲学，听讲者不仅有中国留学生，还有许多日本人士。

我外祖母章珪九岁那年，即奉太炎先生之命东渡去日本。她当时所乘坐的是一艘外国轮船，船上吃的是西餐，服

务人员都是外国人，其中也有几个是日本人。一天中午，外祖母去船上餐厅吃饭，第一道菜上来就是炸牛排，餐具只有刀、叉，并无筷子可用。外祖母那时年纪幼小，从未使用过刀、叉，刚叉住那块牛排想用刀切下一块来的时候，正好船身一倾斜，牛排连同盘子一起向餐桌对面飞去，把站在那里的一名招待员浇了一身油。那位原来衣着毕挺的招待员的狼狈相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出于礼貌和“顾客至上”不便发作，但那副紫涨的面皮和闪烁的目光却不由得九岁的外祖母不胆战心惊。经过这可怕的一幕之后，她发誓再也不去餐厅吃饭了。勉强熬到次日中午，肚子早已饿得叽咕乱叫，随身所带的食物都已吃光了，正在徬徨无计之时，随着敲门声一位端着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面条的招待员躬身而进。

“小姐，请用膳。”随即递过一双象牙筷子来。外祖母大喜，正要道谢，抬头一看，眼前这位笑容可掬、恭身侍立的恰恰正是昨日那位凶神恶煞似的招待员。外祖母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匆匆吃完面条。在这段时间内，招待员一直侍立在一边，直等外祖母吃完并擦过嘴揩过手之后才含笑退出。后来才知道，这位招待员是一位日本人，他不知从何处得知外祖母是太炎先生的女公子，故一反旧态，变得分外恭敬和殷勤起来。后来，太炎先生听说这段趣事也十分感叹。由此可见，太炎先生当时不仅在国人眼中，而且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有很高的地位。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太炎先生曾一度寄幻想于袁。不久，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日益暴露，太炎先生也转而反袁。1913年，太炎先生接共和党之急电促召入京，其时他已知此去北京凶多吉少，故在《致伯中书十三》中明确表示：

“吾虽微末，以一身撓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

戾，亦何惜此孱形为。”以“时险挺剑去长安”的气魄，于8月11日抵京。不久，即以“大勋章为扇坠，临大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攘窃国柄，以遂私图”。遂被幽禁于共和党党部右院斗室中。其时，太炎先生的起居、活动都受到监视，宪兵、便衣不离左右。太炎先生在墙壁、窗纸上遍书“袁贼”二字，或掘树书“袁贼”焚而埋之，以泄心头之恨。此后又被幽禁于龙泉寺内。当时，袁世凯曾假惺惺地派他的儿子袁克定送去锦缎被褥，均被太炎先生烧成大洞后掷出窗外。据说，袁世凯曾想派人暗杀太炎先生，后被陆建章劝住，说“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仍图收买太炎先生。但是，太炎先生全然不为所动，并致书袁世凯，表示“九死无悔”，进行绝食。终使袁世凯害怕，方把太炎先生从龙泉寺迁往北京钱粮胡同四号居住。1915年3月，太炎先生生长女歿，小女珪及长婿龚宝铨等进京探视，后陪伴太炎先生居于钱粮胡同。钱粮胡同四号素有“鬼宅”之称，每日夜幕降临，院中便风声凄厉，哀哀的哭声、尖锐的叫声、刺耳的狞笑声此起彼伏，声声传入房中，彻夜不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袁世凯指使军警执法处派人装鬼以吓唬太炎先生，以瓦解其斗志。太炎先生也有他自己对付特务的办法，他曾对那些由特务扮演的“服役人员”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四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行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还说：“你们要吃这碗饭，就照做，要不就滚蛋。”同时，太炎先生每逢初一，十五，还特别对其中的一个特务头目讲一段《大戴礼》。但是，在袁

世凯所派特务的折磨以及当时报纸的造谣中伤下，太炎先生的精神每日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每晚睡得很少，亦很少与子女们谈话。同年9月，太炎先生长女焄因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于一天晚上吊死在院内一棵大树上。长女死后，虽然鬼叫之声似乎较前减少，但那种阴森森、凄惨惨的气氛却有增无减。太炎先生亦常常恶梦缠身，时时在半夜惊叫而醒。1916年元旦，袁世凯改民国为洪宪元年，行将称帝，局势十分紧张，特务走狗也加紧迫害太炎先生。那年元宵佳节，家中照例要吃汤圆。晚餐时，一盘汤圆端上桌子后，大家都停筷不前。太炎先生看到我外祖母等个个愁容满面、忧心忡忡的模样，便举筷夹起一个汤圆送到嘴边，又停筷说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说完一口将汤圆吞进口中，几口就咽下肚去。太炎先生幽默的比喻，乐观的情绪，引得大家笑逐颜开，不一刻一盘元宵便被消灭得一干二净。不久，袁世凯气死，太炎先生也就此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幽禁生活，重获自由。

一般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晚年，革命意志逐渐消退，认为他学佛、读书是消极的表现。其实，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太炎先生仍在探索，仍在追求。他六十寿诞时，宾客盈门。当时曾留有一卷“长轴”，开首便是太炎先生生日自述诗一首：“蹉跎今六十，斯世孰为徒？学佛无乾慧，储书不愈愚。握中余孟虎，楼上对香炉。见说兴亡事，挈舟望五湖。”

我们可以看出太炎先生对学佛与读书是表示怀疑的，而对国家兴亡并非置之度外。从这首小诗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太炎先生的呼唤：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长轴”曾收录当时贺寿来宾的诗词、文字、印章等，实不失为了一件珍贵的文物。可惜在十年浩劫中，都付之一炬了。我外祖母冒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危险，将太炎先生这帧手迹从“长轴”上剪下藏入箱底，才得以保存下来，留作今日作为历史见证。

吕公望先生自传

1879—1925

(一)

1879年，我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府永康县西乡三十里坑横溪庄。父春悟，母马氏。有同胞兄弟五人，第一、二、五均早殇。我小名金银，四弟名金玉。我十六岁时，因资质稍聪颖继续读书。第十七岁即辍学务农商，不幸于1914年死了。

1899年戊戌科我进秀才，1900年补廪。这时我父母已心满意足，要我设馆训蒙。父命难违，就在横溪及易川西做了三年塾师。后看到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说清朝腐败，主权无独立，领土无完整，周原膺膺，将沦为外族殖民地。我为此寝食俱废。

1902年，我要外出求学，父母大不以为然，仍要我做塾师。为此我离家到县城去住了约一年。这一年，在县城大嫖大赌大吸鸦片，父母只得让我去求学。但求学所需的款子，要我自己筹措。我将廪出轮到的竹林换洋壹百三十元，于1905年2月出门。这时鸦片已上了瘾，在船上硬卧了一星期，到杭州江干上岸时，面无人色。在杭住永康试馆。约两星期后，进了金、衢、严、处四府公学，但此非本志，不久即退学。

(二)

当我进四府公学后，打听到绍兴有个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秋瑾办的革命组织。据云现住金钗袋巷缙云同乡会内的吕逢樵、丁载生与该学堂有关系。得到这消息，立即去拜望吕逢樵、丁载生。那时我在永康薄有文名，因此一见如故，什么话都和盘托出。他们慨允介绍我到徐锡麟和秋瑾那里去。

大概过四、五日，吕逢樵、丁载生来，约我于某一星期在缙云同乡会与秋瑾见面。秋瑾年约三十，一身男装打扮，已先我们到了那里。经吕逢樵介绍，秋与我握手后，即谈起清朝腐败的情况。过数日，秋瑾、吕逢樵、丁载生与我从涌金门坐船往白云庵。白云庵在雷峰塔山的北面湖边，供奉月下老人，住持者为意周和尚，亦革命人。我们在一小楼内纵谈清政腐败，非革命不足以救国等事。秋瑾要我到上海《女学报》当主笔，我对文墨生涯不感兴趣，想学军事。推荐我的知友胡俊卿当了四个月的《女学报》主笔。

不久，吕逢樵、丁载生二人回缙云，秋瑾到杭州来。我主张到军队里去运动，秋瑾主张利用亡命之徒。后因所用非人，秋瑾的主张没有收到效果。秋瑾还主张每个会员交出十元英洋打个用光字头复字脚的“爰”字标志的戒指，凭此联络革命党人。经过这两件事，我对光复会很灰心。刚交秋的时候，徐锡麟、马伯平、陈光汉三人到安庆候补去，住在白云庵，秋瑾邀我去相见。徐问我的身世，他说：你是一个廪贡生，肯冒险入光复会，很难得，我也是一个拔贡，前年与陈光汉、马伯平、陶焕卿四人到日本想进士官学校，一个满洲

学生监督说我们体格不合格，士官学校进不去，就回国捐了四个候补道。除陶焕卿自愿到南洋一带运动外，我三人到安庆候补，俟机而动。革命非有武力不可，最好你混进军队伺机进行，这是较有把握的。并说秋瑾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凡事你多和她商量。临别时，他对我说：法国革了八十年的命方得成功，我们中国的革命还未开始呢。我到安庆去是预备流血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我的流血而有惧心，革命就有希望了，你呢，一定要混进军队去才好。别后，我玩味他“预备流血”这句话，真是感触万分，我投军的主意更坚定了。

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去抚署卫队当兵。这是因为：一、这个卫队不会开动；二、接近省首府；三、占据要害。我写了个呈文递交巡抚张曾敭。第三天由文巡捕某来传见。据说，呈文内有“揆之初度，本日桑弧蓬矢而来，念厥前途，还当马革裹尸而去。”这几句话，为抚台赏识。当时卫队士兵二十名，已足额的，因饷有一定，不便再补，让我进了随营学校当学生。并告诉我明年北京要开办陆军大学，可以送我去入学。

1906年3月随营学堂成立，陆军部陆军速成学校也招考，浙江省考送40人，我是其中之一（蒋介石亦其中之一）。动身去北京前，秋瑾自上海来杭。当时她正准备举事，意欲不让我去北京。经过再三商讨，最后还是让我去北京。并约定，如举事，立即赶回。

1906年5月12日。从拱宸桥坐轮船到上海。在上海找好去天津的轮船，中间停三、四日，我就乘机 and 童保暄、张鸿翔、叶志龙、林竞雄、倪海薰、王萼等到《女学报》，一一介绍与秋瑾。当时大家都欢乐地填了入党志愿书。秋瑾说：“你们一共有40人，今日就有这么多同志，我真兴奋，

但现在时局很紧急，万一有机可趁的话，我很愿你们都回来，我有紧要的事，就要回绍兴去了。谁知这次分手，竟成永别，痛甚！

船到天津过了两日，就到了保定，等候复试。大约在六月十四、五日，看报载徐锡麟刺恩铭被挖心致祭；绍兴贵太守查抄大通学堂，秋瑾被杀。并说贵太守抄出革命党籍簿云云。童保暄等惶急万状，林竞雄约我逃走，我以为不革命则已，革命就不能离开军队；离开军队，此后无事可做，生不如死的好。于是大家隐忍下来。七月一日经过复试入学。这时学校要从每个省的学生中选年轻的二人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浙江选到蒋介石、项鹏。

学校规定自七月初一到年底算第一学期，名为普通班。到十二月分科考试，我考入第一班，习炮科。入校后我是连星期日都不出去的，趁星期日同学外出时，专找字纸篓里同学往来的信件，了解他们，如有同志，我就与他交朋友，经过三年，共交了二十三位同志，在隔壁陆军大学肄业的有孙岳、何遂二人。

1909年我从炮科毕业，即接受何遂、王勇公之邀，到了广西。

(三)

我是由浙江送出的学生，按规定毕业后应回浙江做事。我不得已回浙江，由督练公所派我到八十二标第二营见习。我辞职不准，遂私自赴上海与王勇公会合，于1909年2月由上海趁轮赴桂，十二月廿九日到达桂林，同行有日本士官毕业生孔庚、季书城、杨曾蔚、覃流金、王勇公，孙孟戟、尹昌衡、刘昆涛、林知渊、杨明远等约三十人。

1910年正月初我们拟计划办一学兵营，招新兵一营，以孙孟戟充营长；办一军事干部学堂，以陈之骥充堂长。雷寿荣为陆军小学堂监督，杨曾蔚为兵备处襄办，孔庚为兵备处军需科长，田稼轩为赴蒙古购马委员，我到考功科任科员。在各事进行得很有头绪的时候，却接连出了几件事。尹昌衡、覃流金等坚决要办一份《指南报》鼓吹革命，第一期印二千份，几日就销完了。巡警道胡铭盘派警封闭，尹昌衡等改出《南风报》印了四千份，又销售一空，巡警又来封闭。第三次又改名为《南报》，招牌刚挂出，胡铭盘（嘉兴人）就以同乡名义邀我相见（我在报馆内管财务），他对我说：“吕先生我们是浙江大同乡，特邀你谈谈与你们性命很有关的事，你们几个人所办的《指南报》、《南风报》都是鼓吹革命的，大帅看见愤怒得了不得，我怕你们闯大祸，我在这里代你们斡旋，你们这次又改为《南报》。广西还没有报纸，我不干涉你们办报，但每期的稿子要送我看，否则我这肩子挑不了。请你亦对他们说明，大家好相安无事，这是要请你们原谅的。”我答应他回去商量再说。何遂在干部学校里当教员，他在操场向学生宣传革命，最后激动地对学生说：“你们赞成革命的就上天桥跳下来以表示决心！”因此有些学生就上天桥跳，结果一个学生跌坏了。这事也传开去了，这是第二件。

有一天，桂抚张鸣岐请杨曾蔚、陈之骥、尹昌衡、孙孟戟几人吃便饭，张抚先凑着他们谈革命，并把身藏的短枪拿出来，说：“我是赞成革命的，因此我随身带着手枪，随时可练习练习，预备将来好用。”尹昌衡接着手枪连放三枪，将会客室二块窗玻璃打破了。张抚呵呵大笑，尹昌衡遂向他透露革命情况，并说要举大帅为首领，张抚不露形迹含笑饮

酒，席间并赠每人一把用红布扎好的安南刀。杨曾蔚回寓后醉薰薰地对我说，我今天得四宝：（一）安南刀，（二）岳飞象，（三）得一美妾，（四）得到张大帅这样一个大同志。我听到这话，内心甚为恐慌，前思后想，一夜不能合眼，知祸事发作不远了。

大概是五月期间，张鸣岐秘密调蔡松坡来接充学兵营的营长及干部学校的校长；蒋尊簋接充兵备处总办；董绍基接充雷寿荣的陆军小学堂的监督。不久，雷寿荣被扣押，蒋尊簋升我为军需处一等科员。王勇公、陈之骥、杨曾蔚等以为我出卖他们，勇公的妻子讽刺我说：“吕科员现在是蓝顶戴了，过二、三年就可染红了。”我对她说：“我现在不分辩，不久你们是可以谅解我的；照现在情势讲，你们以速出走为是。”有一晚，我陪王勇公夫妇、孙孟戟夫妇去看戏，看到一半，王的护兵赶来说：“军需处长孔庚被拿。”大家愕然，戏也不看回到勇公公馆。勇公说：“怎么办？”我说：“等到明早托王芝祥设法去（王芝祥是桂省按察使，曾兼兵备处总办）。我回兵备处不多时，王勇公穿军装佩开口军刀来说：“戴之（我的表字），我要与蒋尊簋去拼命！”说完就走，我一把将他抱住。他又说：“不让我去拼命，我只有自杀了。”顺手将刀抽出。我将他连手带刀紧紧抱住，叫当差的将佩刀夺去，他尽力挣脱，跑入蒋尊簋室，大骂特骂。我差五六个人送他回公馆。我回兵备处时，蒋已坐轿上抚署向了。约一小时才回来，我即跪在他面前口禀说：“我是来向总办自首的，我和王勇公等均是革命党，大家到广西来是准备起义的。总办在浙江开办同学堂的时候，秋瑾曾告诉我你亦是同志，如果是同志，应设法救救他们，否则我亦情愿一

死了之。蒋说：“大帅明晨八时要军事会审，说要杀几个脑袋给他们看看，大帅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我是无法可想的。”我说：“总办在日本留学时对国内外的情形是很明白的，请总办再想想有格外施仁的办法没有。”我跪着大概有半小时之久不起来，最后蒋才说：“这事你去求王芝祥或者王有办法。”我说：“谢谢总办，如此就有救了。”我到了王勇公公馆，有十多人坐在那里。一见到我，王勇公太太抢先说：“现在已半夜多了，你还来此探听什么消息？”我将我跪求经过情况述了一遍，并说，时间已迫，形势危险万分，我们统统到按察署求王芝祥去。于是就一齐到按察署去叫门，王芝祥（字铁珊）起床传见。我即将全盘情况陈明，王芝祥开口骂道：“你们这群小孩子太胡闹了，我不救你们太可怜，我若救你们更不知道要闹到什么地步。”我说：“请总办原谅我们没有阅历，经过这次我们是再不敢了。”他叫我们在这里等，他马上到抚署去。约过一小时回来了。他说：“大帅前我说了许多话，已允许不军事会审了，但王勇公、孙孟戟、杨曾蔚，陈之骥等限三日内离开桂林，这是你们要遵办的。”我听了这话，心头宽了几百倍，回兵备处，睡了一个安稳的觉。第三天我送王勇公等上了船。约过一个月，何遂自边关回来。这时张鸣岐带蒋尊簋到北京觐见去了，沈秉坤来桂护抚，蔡松坡兼兵备总办。我即辞职与冷遹同行，过香港上九龙赵声处与黄兴、胡汉民聚会。约一星期后与冷遹回上海。

我离浙江到广西，因辞职不准是私自一走了之的，后闻协统杨善德要缉拿我，这时回浙江，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处分。于是，先托同学倪海薰稟明督练公所总参议袁思永，先将我调回督练公所经理科差遣，离开杨的范围，我始回浙。在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中陆军的统计新军预算，大多数是